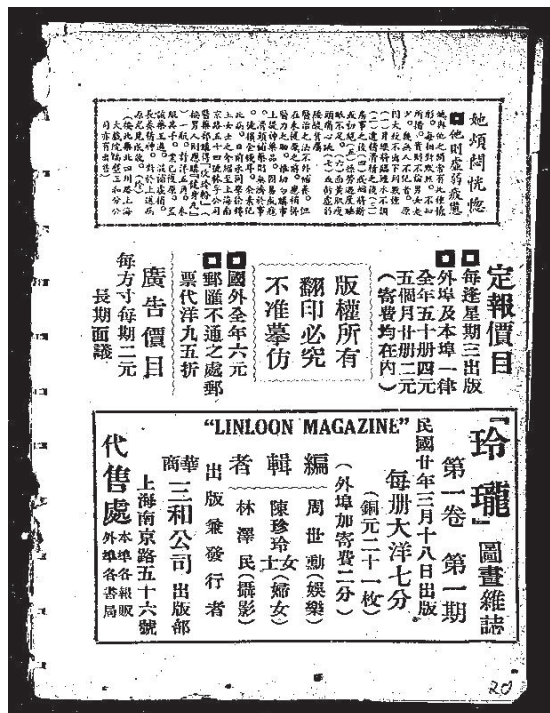


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下，民间出版了许多女性杂志，《玲瓏》就是一例。该杂志在1930年代的上海享誉盛名，风行一时。本文会以此为引子，述说1931年至1937年期间上海的「摩登女性」风潮与新兴的女性经济。

《玲瓏》杂志的背景资料



《玲瓏》001期杂志相关资料
(图片来源：哥伦比亚大学资料库)

《玲瓏》是一本女性杂志，其尺寸体积非常小，只有64开¹，小巧精美，故名「玲瓏」²。该杂志在1931年3月18日发行创刊号001期，共连载七年，出版298册。1932年，杂志一度因淞沪战争³停刊，之后继续办刊⁴，后因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再度停刊，1937年8月11日为最后一期⁵。

创刊宗旨：增进妇女优美生活，提倡社会高尚娱乐⁶。

出版性质：周刊，每逢星期三更新，全年出版五十册，每年为一卷⁷。

出版商：三和出版社，位于上海南京路56号⁸。

编辑阵容：林泽苍、妇女版陈珍玲、常识版曹冰冷、娱乐版周世勋、摄影林泽民，后陆续加入彭兆良等人⁹。

售卖地点：上海各大报馆，为便利外地读者更提供邮寄服务¹⁰。

《玲瓏》有什么内容？

《玲瓏》所载大多是与女性相关的软资讯，内容多样化，有生活类题材，比如时尚风格、美容健身、音乐（乐谱）、电影快讯等，亦有情感、心灵类，如婚姻爱情、家庭，两性关系；且有社会时事类、广告购物类、活动类，如抽奖，约稿与投稿，每期必有「玲瓏消息」，解释出版资料。

¹ 孔令芝：《从玲瓏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（台北：稻乡出版社，2011），页18

² 同上注，页40引《玲瓏》001期，1931年3月18日，页34

³ 淞沪战争又称「一二八事变」，是日本在1932年1月28日发动的侵略上海之战争

⁴ 孔令芝：《从玲瓏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页18

⁵ 同上注

⁶ 同上注，页40引《玲瓏》001期，1931年3月18日，页13

⁷ 同上注，页18

⁸ 《玲瓏图书杂志》，《玲瓏》001期，1931年3月18日，页20

⁹ 孔令芝：《从玲瓏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页36-37

¹⁰ 《玲瓏图书杂志》，《玲瓏》001期，页20

《玲瓏》有何重要性？

在清代以前，社会识字率低，女性作者更是少之又少。女性即使有读书机会，也只是学习诗词类及《列女传》等女学。社会由男性主导，在一众男性所写的作品中，我们难以了解女性的内心世界，更遑论听到她们的真实声音。《玲瓏》在1931年至1937年连载，并发行各地，我们可从中得悉该时期的艺术、社会及政治改变，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本女性杂志，可供女性读者投稿及咨询，亦有栏目收录编者与女读者的对话，是了解女性声音的直接方法。

不仅如此，《玲瓏》的创立宗旨是提倡新女性概念，让女性觉醒，对民国乃至之后的女性发展有深远影响。张爱玲认为《玲瓏》意在「以现代欧美女性身体为参照，教导帮助女性如何从头到脚、由内而外地成为现代摩登女性」、「鼓励妇女通过社会的高尚娱乐来追求美好生活」¹¹。

《玲瓏》与上海摩登女郎

「摩登」是Modern的音译，「摩登女性」的概念于1930年代开始在上海兴起。女性透过反思自身、立足国权、女权等新理念，一改传统女性为男性的附属¹²，且禁锢在闺阁的形象¹³。《玲瓏》讨论时尚服装、消费活动到交际礼仪，推进女性的社交公开¹⁴。《玲瓏》的特点是彩色印刷封面，而封面人物几乎都是女性，她们多为年轻貌美的名媛闺秀、学生、运动员、明星¹⁵，也有国外当红影星及儿童模特¹⁶。封面女郎身穿现代服装，宣传要成为新女性就必须从外形改变。

名媛闺秀

名媛本身家境殷实，且有较高的教育水平，活跃于交际圈；她们爱表达自己，所以乐于拍摄相片，并视登上杂志封面为荣耀¹⁷。



《玲瓏》001期封面
(图片来源：Wikimedia Commons)

¹¹ 洪长晖、王志敏等：〈《玲瓏》杂志广告定位策略与女性形象建构〉，《文化与传播》，2015年06期，页46-50引张爱

¹² 玲：〈谈女人〉，原刊于1944年3月《天地》月刊第6期，亦载于《张爱玲作品集——流言》（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

¹³ 1997），页70

¹⁴ 《仪礼·丧服·子夏传》的女性三从：在家从父、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

¹⁵ 史敏：〈摩登言说中的女性存在——1930年前后中国都市现代女性的新潮〉，《黑龙江史志》，2015年01期，页

¹⁶ 167-169同上注

孔令芝：《从玲瓏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页71

《玲瓏》045期，1932年1月27日出版，封面为三十年代美国当红影星珍妮特·安娜·麦克唐纳（Jeanette MacDonald）；而088期，1933年3月22日出版，封面则为爱群女校幼稚生臧韵芬；237期，1936年5月20日出版，封面是秀兰·邓波儿，她是三十年代活跃于荷里活的知名童星

¹⁷ 孔令芝：《从玲瓏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页70

《玲珑》001期创刊号的封面女郎为周淑衡，她是邮票大王周今觉的女儿¹⁸，也就是当时的名媛。封面中周女士头梳时髦的卷发，上身穿淡绿色短衫，单手抚心，状似西子，下身着粉色长裙¹⁹。她直视镜头，神态淡定，配上夸张的菱形耳饰、珍珠项链和手镯，尽显华贵。李国绶及潘振坤亦曾登上杂志封面²⁰，前者皮草配旗袍，以首饰点缀；后者身披白色披风，两粒大珍珠耳饰甚是醒目。而北平名媛许丽娜，则梳卷发，身穿无袖旗袍，双手持花瓶，眼睛斜斜看着花瓶²¹，诸多例子不胜枚举。

分析：

名媛生活奢华、追赶时髦，这从她们的服装打扮可见。她们比一般女性更重个人形象，且敢于打扮，多以夸张的珠宝和服装剪裁凸显身份。由于并非每个人出生都有良好的家世，故此《玲珑》刊登名媛为封面，内页也附上她们的经验，为时下女性提供参考范本²²，让每个女性都可以成就更好的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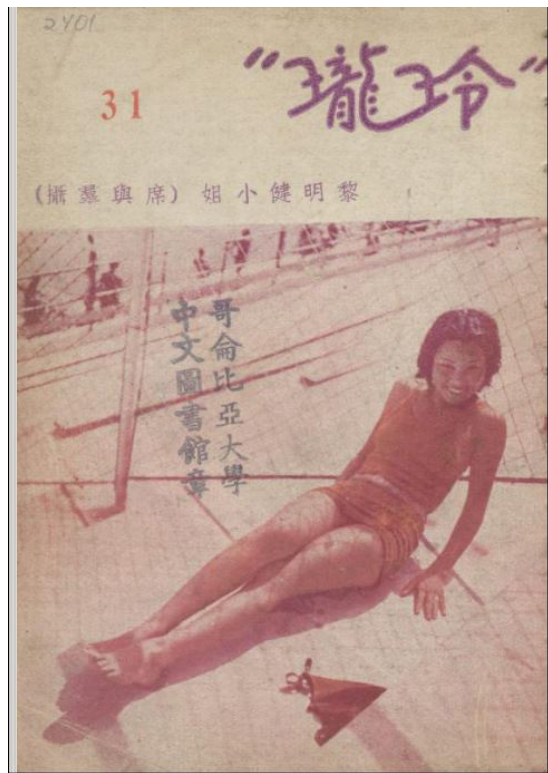
女学生

民国时期兴起女性读书的风潮，而女校的成立令社会产生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新群体——女学生。她们是正受教育的花季少女，立志成为新时代女性，因此踊跃展现个人特质，投刊《玲珑》杂志，成为封面女郎。002期封面为李月嫦，她是沪江大学的女性领袖，不但品学兼优，同时擅长演戏与辞令。封面中的她身穿粉红色旗袍、卷短发，恬静地坐着。而第100期特别刊的封面是刚从崇德女校毕业的女学生夏志勤²³，她与李月嫦相同，侧分卷发、穿波点蓝色旗袍，微笑望向镜头，神态自然²⁴。另外，中西女塾的学生秦昭华²⁵、南京汇文女学的谢文息²⁶及北平女子垒球第一名的周戴芬²⁷，均以女学生的身份登上《玲珑》的封面。

分析：

为普及女性教育，民国时期新建不少女校，从而催生了庞大的女学生群体。其中以上海地区有最多女校，包括沪江大学、中西女塾、圣玛利亚女校、崇德女校、上海美专。其他大城市也有女校，例如北平民国大学、南京汇文女校、苏州东吴大学、广东体专等²⁸。

1932年，全国女学生共计106793人²⁹，而上海的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较高³⁰，该地区各类学校所吸纳的女生远超其他地区，中等师范学校的男女学生比例甚至达到了三七七³¹。学历的提升意味着识字率的上升，而这批女性是妇女刊物最主要的读者群体，她们的消费能力也相对较高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女性经济。



《玲珑》298期封面影星黎明健
(图片来源：哥伦比亚大学资料库)

¹⁸ 孔令芝：《从玲珑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页70

¹⁹ 《玲珑》001期，1931年3月18日，封面及页2

²⁰ 《玲珑》006期，1931年4月22日，封面：李国绶，孔令芝：《从玲珑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页72指她是李鸿章侄儿李经溥的女儿，精通法文，又通诗词及钢琴；《玲珑》007期，1931年4月29日，封面：潘振坤，毕业于中西女塾，闻名于社交界

²¹ 《玲珑》282期，1937年4月21日，封面

²² 孔令芝：《从玲珑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页74

²³ 《玲珑》100期，1933年6月21日，封面

²⁴ 孔令芝：《从玲珑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页72

²⁵ 《玲珑》039期，1931年12月9日，封面

²⁶ 《玲珑》051期，1932年5月25日，封面

²⁷ 《玲珑》190期，1935年6月26日，封面

²⁸ 孔令芝：《从玲珑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页72

²⁹ 张学玲：《彷徨与苦闷：家事和职业间的民国职业女性》，《宁夏社会科学》，2019年03期引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：《中国妇女运动史》（北京：春秋出版社，1989），页283-284；「大学生3290人、专科生559人、留学生89人、中学生69741人、师范生23738人、职业学校女生9376人」

³⁰ 洪长晖、王志敏等：《〈玲珑〉杂志广告定位策略与女性形象建构》，页46-50

³¹ 同上注

《玲瓏》封面女郎与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关系？

《玲瓏》展示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女性形象，有上层的名媛、知名影星，也有女学生代表，显示出一连串的女性图谱。她们或是独自出镜，或是群体合照，或动或静，展现女性自信的一面³²。这一切都归功于新文化运动，引进西方思想和女性教育，打破了封建严肃的氛围，为社会注入开明且自由的空气。由此，女性地位开始得到重视，进而争取个人权益、享受社交生活。

《玲瓏》作为社会教化工具，提出女性解放先从改变妇女的外形开始，美容³³和服饰³⁴的改变是最为直接的。变美非仅为了取悦男性，女性也能透过装扮展现自己的美态，建立自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女性服装在民国时期有很大突破，《玲瓏》封面女郎多熨发、身穿旗袍，这个配搭也是民国时期的潮流打扮。旗袍本为满族女子的传统服装。清末时期的旗袍袍体宽大、腰身平直、衣长至足，遮掩人体曲线³⁵。民国时期产生改良旗袍，正如新文化运动一般新旧交替，东西融合，既保持中原女子直筒长衫的著装习惯，又在审美、工艺方面融合了更多西方服饰元素，如垫肩、蝴蝶领、开衩，甚至是混搭西方外套³⁶。当时中国流行着用花布、条格棉布和阴丹士林布缝制的改良旗袍，这些布料色泽清雅、素净，尤以阴丹士林布造成的旗袍最受女学生、职员甚至闺阁小姐的青睐³⁷。

改良旗袍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方便女性活动。摆脱穿衣观念的束缚，有利女性探寻自我及展现个性，是进化为新时代女性最迫切的需求³⁸。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下，民间抗拒封建礼教的限制，同时对男女平等的要求日益强烈。民国时期女性积极参加社交、工作、学习等活动，故需要礼仪性和实用性兼备的新型服装³⁹。

另一方面，服饰色彩含有刻板的性别意识及传统意义。古代服饰忌讳黑、白两种凶色，因此过节、过年、生育、婚嫁期间不能穿这两种颜色⁴⁰。但

³² 孔令芝：《从玲瓏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页71

³³ 沉怡祥：《现代妇女何以比从前妇女好看？》，《玲瓏》024期，页872：「美容术的强力效用。从前的妇人们不懂得如何化妆，而上世纪三十年代沪上的女子则以美容为一日中必修之功课。这是在美容观念与美容技术上的改变，此外社会还提供了专业的美容师，可以使每个人都享受专业服务。社会的进步导致女子洗澡更方便、更频繁，这使皮肤显得更好看，至少让人看起来整洁」

³⁴ 沉怡祥：《现代妇女何以比从前妇女好看？》，《玲瓏》025期，页901：「（二）服饰的进步……在最近几年中，服饰才有极大的进步。从前是一季只有一种的式样，现在可不不然了。每季总有好几种式样，而且一日间又分晨装晚装运动装跳舞装种种。对于配色，也比从前有研究了，而且各人尽穿自己欢喜的颜色和式样，别人绝不会说你不及」

³⁵ 万程：《从西学东渐解读民国女性服饰与色彩设计》，《美术教育研究》，2012年02期，页86-88

³⁶ 包铭新等：《中国旗袍》（上海：上海文化出版社，1998），页29-31

³⁷ 万程：《从西学东渐解读民国女性服饰与色彩设计》，页86-88

³⁸ 同上注

³⁹ 同上注

⁴⁰ 同上注

新文化运动破除封建的精神，令1930年代的旗袍颜色五花八门，女性可穿的颜色不限于粉红色、大红、大绿、金黄色等，也可选较中性的黑、月白、蓝、灰等色⁴¹。可见在当时的社会整体环境下，色彩的搭配消除了传统的刻板化性别特征⁴²。

小结

新文化运动旨在破旧立新、引进西方思想，这两点都能从《玲瓏》封面女郎的衣着打扮窥见。透过外在的改变，女性能够展现自己的美态；服装打扮的简化，方便了女性从事工作、运动和社交，这是最基本却又是重要的变更。可以说，《玲瓏》是时代催生的产物，同时也反映了民间对妇女发展的关注。

《玲瓏》杂志与民国时期的女性经济

走出家庭的职业女性



《玲瓏》100期〈职业妇女的痛苦〉
（图片来源：哥伦比亚大学资料库）

⁴¹ 万程：《从西学东渐解读民国女性服饰与色彩设计》，页86-88

⁴² 同上注

《玲珑》为读者提供倾诉心事的渠道，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婚姻、家庭与两性关系，更涉及工作和个人前途，可见对职业妇女的关注。许多职业女性会投稿谈谈自己的工作情况，比如第100期的〈职业妇女的痛苦〉⁴³。松子女士向编者述说自己身为职业演员的辛酸：需要应酬许多陌生人，自己因而丢失工作机会的难受⁴⁴。编者见此亦感同身受⁴⁵。这时，民国女性拥有的身份不单是刻板的女儿、妻子和母亲，更有员工，而这个身份和家庭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；可以说《玲珑》让我们看到了1930年代女性正慢慢走出家庭。

不但如此，杂志更专门设置栏目介绍西方礼仪，比如〈赴宴会的礼节〉⁴⁶、〈交际须知〉⁴⁷及〈握手须知〉⁴⁸等，以便女性投身职场应酬和参与社交。许多女性碍于西式礼仪繁琐，因而对社交却步；但《玲珑》的出现，可以指导女性礼仪要项，让她们可以练习应对，无形中给予女性更多向外发展的机会。这些资讯既是妇女成为职业女性所需要掌握的，从而间接鼓励了她们学习新事物，尝试走向社会，造就更多职业女性，两者相辅相成。

分析

新文化运动提倡解放女性⁴⁹，因此国内主要报刊都开设专栏专门讨论妇女问题，如婚姻家庭、经济独立、职业和伦理道德等⁵⁰。1920年代〈新女子应具备的条件〉一文认为新女性应具备六个基本条件⁵¹，其中一项为女性经济独立。

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将妇女经济独立视为男女平权的方法⁵²，因此在1926年1月16日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通过的《妇女运动决议案》提出「男女在法律上绝对平等」、「男女职业平等」等一系列议案，更指出政府应该鼓励各职业及行政机关容纳女子职员⁵³。法案通过之后，

国民政府便向摩登女性敞开了中央机关的就业大门⁵⁴。除了于政府部门工作，妇女从1920年代开始多从事打字、速记、编辑、邮务、图书管理、接线、秘书等职业⁵⁵。

民国时期女性外出工作，经济独立后演变为消费群组，市场亦因此推出与女性相关或者以女性为主的产品，编者称此现象为「民国时期的女性经济」。由此，1920至30年代女性读物涌现，除了《玲珑》，亦有《东方杂志》、《良友》画报等几十本刊物⁵⁶。

《玲珑》的风行程度与女性消费力

《玲珑》发行七年，共计出版298册，期间页数增加、售价及广告费均呈上升趋势。这可反映出杂志当年的风行程度；而即使不断加价，女性也对杂志趋之若鹜，可见民国时期女性的消费力不容小觑。

页数增加

虽然《玲珑》每期页数不定，有些期数为30余页，但有些期数则可达70余页。例如001期的创刊号只有35页，而100期为特别刊物，则增加至79页；最后一期第298期共74页。由上述资料可见，在《玲珑》发行期间，其页数由最初发展到中后期上升了一倍有余，内容也越加丰富。

售价上升

在连载的七年期间，《玲珑》售价不断上升。例如001期每期售七分大洋（21枚铜元），国内全年订阅价四元，国外全年六元；订阅五个月二十册，所资两元正⁵⁷。到了第100期，杂志依然维持一年五十册订阅价四元，但是每册的售价则升至一角大洋⁵⁸；原本的五个月订阅也绑定至半年，订阅价也加了半毛⁵⁹；至于国外订购全年价格则上升至七元⁶⁰。此外，《玲珑》提出更具弹性的订阅方案，读者可以订阅两个月，收费一元⁶¹。最后的298期，尽管半年及两个月的订阅价与第100期相同，但每期售价则飙升至法币一角⁶²、全年订阅价已经上涨到五元；而国外订阅更需要另加邮费二元半，半年邮费则为一元三角⁶³。

⁴³ 《玲珑》100期，1933年6月21日，页978

⁴⁴ 〈广州〉李蕙芳：〈女子职业发展迟缓之原因〉，《玲珑》116期，1933年10月17日，页1927-1933

⁴⁵ 同上注

⁴⁶ 茉莉〈赴宴会的礼节〉，分载于《玲珑》004期，1931年4月8日，页126-127；《玲珑》005期，1931年4月15日，页160；《玲珑》006期，1931年4月22日，页197

⁴⁷ 李子超：〈交际须知〉，《玲珑》007期，1931年4月29日，页232

⁴⁸ 吕璋：〈握手须知〉，《玲珑》049期，1932年5月11日，页2002

⁴⁹ 可参考佩方：〈新女性的两大训练〉，《玲珑》076期，1932年11月30日出版，页1203-1204；许娴贞：〈新女子的责任〉，《玲珑》175期，1935年3月30日出版，页519-521及〈在国势危殆中新女性应该怎样〉，《玲珑》260期，1936年11月4日，页3328-3330等篇章

⁵⁰ 张学玲：〈彷徨与苦闷：家事和职业间的民国职业女性〉，页171-177。篇中指出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胡适纷纷在《妇女杂志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妇女周刊》等杂志上发表文章，号召妇女投身工作

⁵¹ 李永东：〈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新女性形象建构〉，《艺术百家》，2011年06期，页146-150引乔治：〈新女子应具备的条件〉，《妇女杂志》，1927年第13卷第2号，页6-10指出（一）精神解放；（二）实事论事，有务实的态度；（三）确定求学宗旨，学习实用的科学知识；（四）牺牲精神，为解放其他妇女贡献自己的力量；（五）无高傲态，高傲态度不利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及（六）女性应经济独立

⁵² 金石音：〈请问拒用女职员者〉，《妇女共鸣》，1931年第44期，页21-27，转引自史敏：〈摩登言说中的女性存在——1930年前后中国都市现代女性的新潮〉，页167-169

⁵³ 荣孟源：《中国国民党历史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》（上册）（北京：光明日报出版社，1985），页139，转引自张学玲：〈彷徨与苦闷：家事和职业间的民国职业女性〉，页171-177

⁵⁴ 熙宇：〈女职员之任用与妇女解放〉，《妇女共鸣》，1931年第49期，页20-24，转引自史敏：〈摩登言说中的女性存在——1930年前后中国都市现代女性的新潮〉，页167-169

⁵⁵ 张学玲：〈彷徨与苦闷：家事和职业间的民国职业女性〉，页171-177

⁵⁶ 孔令芝：〈从玲珑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〉，页64-65

⁵⁷ 《玲珑》第001期，1931年3月18日，页20

⁵⁸ 《玲珑》100期，1933年6月21日，页987

⁵⁹ 同上注，页968

⁶⁰ 同上注

⁶¹ 同上注

⁶² 《玲珑》298期，1937年8月11日，页2404

⁶³ 同上注

广告收费加价

除了杂志销售的收益，广告收益也是《玲珑》的经费来源。广告收费是按刊登期数和尺寸而定，在最早的001期，广告价目是每方寸每期二元；若长期刊登，价格还可以商量⁶⁴。到了第100期，刊登广告的收费方案是全版每期二十四元、半版十二元、四分一版六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国货在此时期刊登广告是有特别优惠的⁶⁵，但《玲珑》中并无细说具体内容。而298期的广告费用与第100期相同⁶⁶，反映杂志的广告收费系统已经成熟。

有学者认为1930年代发行的杂志，不仅是传播西学、启迪民智、政社合一的工具，更为出版商提供了实际的经济回报⁶⁷。撇除《玲珑》杂志来自销售的基本收益，女性读者会在看杂志的时候得悉广告宣传产品的资讯，若有兴趣便可根据广告的介绍购买，为三和公司带来许多经济收益。由于女性带来的经济效应难以估计，而《玲珑》杂志深受女性欢迎，故此许多商家便在杂志刊登广告宣传产品。比如第100期中便有绪纶绸缎大同行的夏衣大减价广告⁶⁸，以及中国化学工业社的白玉牙膏⁶⁹、利华肥皂有限公司的肥皂⁷⁰、ABC国货的雨衣⁷¹、五洲大药房的滋阴养颜药物——月月红女界宝⁷²等女性生活用品的宣传。另由于《玲珑》的出版商三和公司主要经营进出口代理⁷³，故杂志亦因此有大量与《玲珑》挂钩的商品宣传，例如「玲珑乒乓球」⁷⁴、代理的各种药物及代售的美玲唇膏等实用品⁷⁵，甚至还代客购买及修理摄影器材⁷⁶。

分析：

上文指出在1931至1937年间，《玲珑》的页数增加、售价及广告费均呈上升趋势。虽然没有杂志的准确销售量⁷⁷，但当时上海女学生基本上每人一本⁷⁸；而《玲珑》的售卖地点除了上海本地，还遍布中国各地，例如北平、天津、汉口、苏州、南京、厦门、汕头、长沙、四川，甚至远及香港、小吕宋及新加坡等⁷⁹。由此可见，《玲珑》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靡全中国的女性读物，其对女性的形象塑造有很深远的影响。

从《玲珑》的销售情况来看，发行七年期间，售价有加无减，但坊间依然有大批支持者。据调查，上海在1930年代已形成商业消费空间，围绕静安寺路、同孚路、霞飞路等为中心的购物圈，有27家百货商店、49家首饰店、7家美容院⁸⁰。种种迹象均显示民国时期女性已有一定的经济收入，有些甚至已能达致经济独立。

总结

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妇女的现代化有举足轻重的推进力。从1930年代发行的《玲珑》杂志，我们可见女性在服装造型和身份角色的改变。上海这个大都市新兴大批摩登女性，她们接受高等教育、投身工作，形成独特的经济力量。然而，《玲珑》作为一本妇女杂志，所述的观点是理想化的，当时的职业女性仍在家庭与工作中挣扎，承受社会偏见、职场受挫，社会仍存在严重的男女不平等⁸¹。

⁶⁴ 《玲珑》第001期，1931年3月18日，页20

⁶⁵ 《玲珑》100期，1933年6月21日，页969

⁶⁶ 《玲珑》298期，1937年8月11日，页2404

⁶⁷ 孔令芝：《从玲珑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页28

⁶⁸ 《玲珑》100期，1933年6月21日，页945

⁶⁹ 同上注，页959

⁷⁰ 同上注，页1001

⁷¹ 同上注，页986

⁷² 同上注，页965

⁷³ 孔令芝：《从玲珑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页23

⁷⁴ 《玲珑》025期，1931年9月2日，页919

⁷⁵ 《玲珑》283期，1937年4月28日，页1273及孙丽莹：〈从《摄影画报》到《玲珑》：期刊出版与三和公司的经营策略〉，《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4），第23期，页163

⁷⁶ 孔令芝：《从玲珑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塑造》，页22-23

⁷⁷ 同上注，页32

⁷⁸ 同上注，页4

⁷⁹ 同上注，页29

⁸⁰ 洪长晖、王志敏等：〈《玲珑》杂志广告定位策略与女性形象建构〉，页46-50

⁸¹ （广州）李蕙芳：〈女子职业发展迟缓之原因〉，《玲珑》116期，1933年10月17日，页1927-1933指出女性职业的暂时性、工作跃升难、工资微薄、需要兼顾家庭等因素影响了女性工作的动力；而社会对职业女性也有不少舆论，例如女子工作剥夺了男性生计、影响婚姻、对男女职场不公平的合理化